

李双华 著

吴中派与中晚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双华 著

吴中派与中晚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中派与中晚明诗歌/李双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161-0610-5

I. ①吴… II. ①李…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苏州市—
明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595 号

责任编辑 路卫军
责任校对 玉兰馨
封面设计 苍海光天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36155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张籍《送从弟戴玄往苏州》）李双华于2001年秋入校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三年后按期毕业，而其博士学位论文《吴中派研究》终于在今年秋修订为《吴中派与中晚明文学》即将出版。看到双华博士这部历经十余个春秋的论著，颇多感慨，颇为欣慰，便乐于作序。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比较关注以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为代表的吴中派，觉得吴中派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价值与地位。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正当以李东阳等台阁重臣为主的茶陵派和任职郎署的“前七子”相继称雄文坛之际，远离台阁和郎署的吴中文士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将视线投向山林及市井，缘情尚趣，追求自适和狂放，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文学风貌，成为由元末明初的杨维桢向晚明李贽、公安三袁等过渡的桥梁。因而，我在当时十分支持双华在21世纪之初将《吴中派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楼，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从唐寅的《阊门即事》诗中可以看到，吴中是全国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吴中派的形成有其市民经济的环境。另外，在科举中相继失意，也是吴中派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明代吴中地区科举之风盛行，自洪武以来一直是举人和进士高录取率的地区之一。文徵明曾经自豪地说：“吾吴

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化、弘治间，吴文定（吴宽）、王文恪（王鏊）继起高科，传掌帝制，遂持海内文柄。”（《翰林蔡先生墓志》）在吴中地区热衷科举的氛围中，才华出众的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也素有“继起高科，传掌帝制”的强烈愿望。然而，命与仇谋，屡试不中，祝允明、唐寅仅中举人，始终与进士无缘，文徵明一生未曾考中举人。对此，他们的怨恨刻骨铭心。曾牵涉科场鬻题案而被捕下狱的唐寅在《漫兴十首》其一诗中写道：“十年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内园歌舞黄金尽，南国飘零白发长。髀里肉生悲老大，斗间星暗误文章。不才剩得腰堪把，病对绯桃检药方。”“斗间星暗误文章”，是暗指他因科场案而株连入狱，正是因此而引发了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之叹。显然，科场接连失利的刺激，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的逆反心理，背离了封建社会中文人科举入仕、奉儒守官的正统道路。由此为重要的契机，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在不同程度上疏离朱明王朝及其庙堂文化，转向山林乃至市井文化，显示出吴中地区在野文人卓然自立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心态，迥然有异于当时正宗文坛上的主流派——以李东阳等台阁重臣为主的茶陵派崇儒复雅的文学思潮，和以郎署的新科进士为主的“前七子”宗法盛唐和高格雅调的文学思想。

双华早年曾习美术，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阶段均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逐步培养了艺术趣味，加强了文学修养，由此可见他将在书画艺术与文学成就都负有盛名的吴中派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既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他本人的兴趣所在。双华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已有多年，也已评聘为教授，他没有将《吴中派与中晚明文学》变成评聘职称的著作，而是沉下心来细细打磨，可见其苦心。双华为人朴实、沉稳，刻苦上进，好学深思，对于《吴中派与中晚明文学》，十多年中虽然断断续续，但始终萦怀，多有所思，多有创获，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是力图从新的文学史视角观察吴中派文学。双华试图突破

时下明代文学研究中尊唐宗宋的思维模式，从文学创作实践的角度而不是从概念的角度审视吴中诸子及整个明代文坛的文学风貌。明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口号纷争不断，而后人往往容易以这些眼花缭乱的口号为线索来编排明代的文学发展史。而本书则力求摆脱这些口号的框框，着重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明代复古主义潮流的内涵，细致分析以李梦阳为代表的七子派复古思想与吴中文人之复古思想的差异，指出了吴中文人之文学路线与七子派的文学路线的根本不同，并从明代文学的大趋势着眼，从明人创作实际入手，将吴中文人与其他派别放在同一平台上审视，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观察其实际生活和个人情感，力图探明吴中文人的情感世界，指出其与明代文学潮流的密切关系，为今人重新认知吴中派及其文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是对以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为代表的吴中文人的文化性格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双华从吴中派代表人物的个人经历入手，细致考察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术中的种种表现，并从中发现作为东南地区吴中文人的文化性格上的新因素。在具体研究中，通过他们的文学实践深入体察他们的思想情感，通过历史材料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以此把握吴中文人的思想脉搏，探明他们思想行为的文化根源。自明朝建国，朱元璋、朱棣父子与包括吴地在内的南方文人就有嫌隙，吴地文人在政治上与皇权政府始终不甚协调。吴中文人的政治态度一直不大积极，甚至在学术上与皇权政府的官方也不一致，反对科举制度形成的学风；而经济的发展，又使其具有一定的实力，敢于为自己的利益与政府作某种程度的抗争。再者，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使个人的生活世界得以展开，遂使诗歌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成为文学风貌的精神底蕴。这推动了吴地文人文化性格的形成，直至促成文学风气的形成，并成为引领文学潮流的重要力量。

三是给予吴中文学以新的定位，指出吴中文学是明代世俗主

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中国古代诗歌一直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王者之迹、风雅美刺，归依政教的传统，即古典主义传统；另一条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自抒心曲的传统。到了明代，后一条线索便发展成为世俗主义文学潮流。郭绍虞先生曾指出明代存在着复古与启新两种文学潮流，其实指的就是古典主义与世俗主义两大潮流。双华教授提出，明代文学的精魂不在古典主义而在世俗主义，吴中文学不是七子复古文学的附庸，而是代表着与之并行的另一股文学潮流——世俗主义文学潮流。沈周的平民意识，祝允明的异端色彩，唐寅的市井风貌，文徵明的柔中显刚，徐祜卿的覃思发藻，这些都对古典传统形成背离，并成为中晚明文学新潮的重要资源。

四是通过探索吴中文学，力图窥探整个明代文学的实际走向。双华在对吴中派的代表人物仔细梳理的基础上，对整个明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明代经济文化的重心的南移进行了认真考察，用一系列实例与数据证明，明代的经济文化的重心实际上已经在南方而不是北方，而政治上南方的影响已经至关重要。双华认为只以首都在北方而认定北方为文化文学中心的观点已经不能成立。而通过考察明人的文学实践，指出了明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并不是以复古相号召的古典主义，而是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世俗主义。并据此提出：吴中文学不只是只局限于东南一隅的地方文学，而是整个明代文学潮流中的重要代表。全书的论述，既力图摆正吴中文学在明代文学史中的位置，又对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

由双华对于吴中派的研究，我也想到明清吴地文学的研究，如明初吴中四杰、明中叶吴中四子、吴江派（戏曲）、明清之际的云间派、清初苏州派（戏曲）、阳羨词派、清中叶沈德潜与格调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清代吴中词派等都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而且也要对人们较少关注乃至长期忽视的皇甫四杰、锡山四友、高叔嗣等古澹派、长洲三张、嘉定四先生、虞山诗派、娄

东诗派、毗陵（常州的古称）四子、毗陵六逸、毗陵七子、毗陵后七子等进行开拓性的研究，考察其流派（结社）形成、发展的过程，关注其中的人际交往、文学活动，有重点地进行流派成员考与交游考，把握作家与流派风格，全面清理吴地明清文学流派的遗产，在坚实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整体地把握吴地明清文学流派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认清明清以来的吴地是流派意识最为鲜明、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并还原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显然，吴中派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值得进一步深化的课题，吴地明清二代文学与文化更是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学海无涯，任重道远，我与双华共勉之！

陈书录

辛卯年“极目江南总是秋”之时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 缘起	(1)
二 吴中派文学研究述略	(9)
三 所谓吴中派	(17)
第一章 弘正文风与吴中文风	(32)
第一节 吴中文学之特质	(32)
第二节 吴中文风的个体化倾向	(43)
第三节 吴中文风与台阁文风	(54)
第四节 吴中文风与七子文风	(64)
第五节 吴门画风与吴中文风	(73)
第二章 吴中士风与吴中文风	(79)
第一节 吴中文人的政治态度	(79)
第二节 吴中文人的仕与隐	(87)
第三节 吴中文人的生活态度	(95)
第三章 吴中学风与吴中文风	(103)
第一节 宋明理学与吴中学风	(103)

第二节	吴中学风对文风的影响	(111)
第四章	平民文人沈周	(118)
第一节	沈周的家世及生平	(118)
第二节	沈周的人生态度	(130)
第三节	沈周的诗歌艺术	(144)
第五章	吴中怪杰祝允明	(163)
第一节	祝允明的家世教养及人生态度	(163)
第二节	祝允明的学术思想	(171)
第三节	祝允明的文学思想	(177)
第四节	祝允明的文学创作	(183)
第六章	市井文人唐寅	(196)
第一节	唐寅的生平及人生态度	(196)
第二节	唐寅的思想性格	(202)
第三节	唐寅的文学创作	(213)
第四节	唐寅的意义	(220)
第七章	吴中文坛盟主文徵明	(238)
第一节	文徵明的生平及人生态度	(238)
第二节	文徵明的思想性格	(248)
第三节	文徵明的文学创作	(255)
第八章	吴中诗才徐祯卿	(264)
第一节	徐祯卿的生平及思想	(264)
第二节	徐祯卿《谈艺录》写作时间考	(269)
第三节	徐祯卿的文学思想	(275)
第四节	徐祯卿的诗歌艺术	(283)

第九章 吴中派与中晚明文学	(291)
第一节 北与南的变迁	(292)
第二节 民间社会的成长与世俗化浪潮的兴起	(302)
第三节 吴中派在中晚明文学史上的地位	(318)
结语	(343)
参考文献	(349)
后记	(359)

绪 论

一 缘起

吴中自古文风繁盛。在上者名公巨卿宗主文坛，震动一时，布衣韦带之士亦擒章染翰；下至闾阎畎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节。明自开国以降，吴中文坛，人才辈出。陆师道曰：“洪武初，高、杨四隼领袖艺苑；永宣间，王、陈诸公矩矱词林。至于英、孝之际，徐武功、吴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当均治，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风景服，靡然从之。时则有若李太仆贞伯、沈处士启南、祝通判希哲、杨仪制君谦、都少卿玄敬、文待诏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国、蔡孔目九逵先后继起，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宣，黼黻并丽。吴下文献，于斯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①

然而长期以来，许多史书给人们的印象是，吴中文学自高、杨、张、徐领袖文坛，永（乐）、宣（德）以后便寂寂无闻。尽管在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文坛上，吴

^① 陆师道：《袁永之集序》，袁袞：《胥台先生集》卷首，明万历十二年衡藩刻本。

中文人身影频现，然而除徐祯卿入前七子、王世贞入后七子及归有光外，作为团体性的文学力量，似不可与七子争锋。而徐、王之入前后七子，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吴中文学的处境：这是一个可以忽而略之的文学集体。因而自《明史·文苑传序》以降，大多数文学史论著或教材都很少叙述甚至不叙述明中叶的吴中文学状况。

但是，史书毕竟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是一个多面体，叙述角度的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袁宏道曰：“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①并历数吴宽、王鏊、沈周、唐寅、文徵明、祝希哲、徐祯卿诸贤，指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吴中文学的独特意义，对他们在一片复古声中能独抒性灵、不事模拟甚为赞赏。钱谦益对吴中文学亦有较高评价：“吾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弘之间，吴文定、王文恪遂持海内文柄，同时杨君谦、都玄敬、祝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在人。”^②

王夫之对吴派诗歌也极力推举，曰：“弘正间希哲（祝允明）、子畏（唐寅）、九逵（蔡羽）领袖大雅，起唐宋之衰，一扫韩苏淫波之响，千秋绝学，一缕系之，北地信阳尚欲赅颊而争，诚何为耶？”并盛赞唐寅“起齐、梁、唐、宋、元六代之衰”，^③高度评价了明中期的吴中派文学，甚至以为超过了七子派的地位。而近人胡适之说得更“极端”：“明诗正传，不在七子，亦不在复社诸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正如清文正传不在桐城、阳湖，而在吴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诸人也。”^④大有改写明代文学史之意味。

① 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袁宏道集笺校》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95页。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③ 王夫之：《明诗评选》卷4，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129页。

④ 胡适：《王阳明之白话诗》，《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页。

这些言论往往被认为是过誉之词、不经之谈，人们一般视为戏言，绝不当真。然而就是这种看似戏言的论说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意蕴，值得我们沉潜玩味。当然，用传统的思维方法是难以洞晓吴中文学的价值的。如若将传统的古典主义诗学观点悬置起来，换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吴中文学，或许就会得出全新的认识。

从现有的文学史叙述来看，吴中派文学的声势确实不如七子派烜赫。吴中文人在政治上有明显的退避倾向，不如李梦阳等新进士那样在政治上雄心勃勃，文学上亦无党同伐异之作风。即使吴宽、王鏊，身为台阁重臣、领袖词林，亦不呼朋唤友，自相标榜。他们的文学观点不像七子那样走极端，持论较为公允、通达，以致有人认为他们这种态度反而削减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影响力。从表面上看，事情确实如此，但实际上这是对吴中派文学的误解。若我们放宽视野进行观察，则不难看出，吴中文学正是顺着古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在文学上走着一条与传统的评价体系相背离的道路。正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他们的政治志向和人生情趣合逻辑地发生根本的转变。在文学上，他们已经不再遵循传统的附庸于政教的模式，而将文学兴趣转向了日常的世俗生活。而这，正是明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

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文学一端，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转折。柳诒征先生曾指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纵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①他认为，中唐以后，国运之鼎盛期或已过去，然文化事业却向更高峰发展。文物制度，继往开来，“文学、工艺、美术、制造，无不各有所新创”。而“宋元之诗文家极夥，稽其数量倍蓰于唐”。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内质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①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488页。

自宋以还，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社会人群中的文化程度逐渐提高。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后，偃武修文，文化逐渐普及。而按中国的教育传统，写诗作文为受教育者之基本技能，社会上从事诗文写作者激增，因而在明代，诗歌创作无论作者数量还是作品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诗文内容也随之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诗歌情趣发生变化，平铺漫流，无事不写。中唐以前，文人大都以政治事业为第一生命，为自己的终极价值之所在，在诗作中主要抒发的是政治情怀，“兴观群怨”、“事父事君”、“风动教化”、“正变美刺”等等，是其诗歌创作的理论准则。正如章学诚所说：“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抒其所愤懣。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① 写诗作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而不能沉溺于个人一己之私。中唐以后，更多中下层文人跻身于社会政治舞台，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生活内容也日益丰富，社会风气逐渐转变，文人在寻求政治功业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状况。白居易有诗云：

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领，旬以会亲宾。
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宴频？下车已三月，开筵始今晨。初点军厨突，一拂郡榻尘。既备献酬礼，亦具水陆珍。萍醅箬溪醕，水鲙松江鳞。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清奏凝未阕，酡颜气已春。众宾勿遽起，郡僚且逡巡。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

① 章学诚：《言公》上，《文史通义》卷2，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9页。

②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卷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0页。

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①

公事之余，非常注意调养身心，充分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白居易虽然在此处还提到“九日勤”，但很明显，其人生乐趣却集中在“一日醉”上。正如李泽厚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虽然标榜儒家教义，实际却沉浸在自己的各种生活爱好中：或享乐，或消闲；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更多的是相互交织配合在一起。”^②一方面，仍然寄壮志于治国平天下，希冀着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对世俗的生活、对宝贵的个人生命、对个人生活的乐趣却愈加重视。“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境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③发展到明代，文人在诗歌中重点关注的已不再是家国天下，忠君爱民，不再突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④的宏伟志向，也不是倾泻“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⑤的激愤，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情怀、山水之乐、友朋之情、光阴之叹，乃至在别人看来一件毫无意义的琐事或感触，都可以敷衍成诗。文学作品中那种古典主义浑厚雄壮之美渐渐淡化，起而代之的是对日常人生琐事的关注：诗酒酬唱、迎来送往，花落叶黄、阴晴雨雪，甚至眼花缭乱、腿颤齿摇亦能敷衍成篇。记序传赞，连篇累牍，几成吃饭穿衣，许多作品只徒具形式，似毫无文学价值。诗文到此，似俗滥极矣。

① 白居易：《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僚》，《白居易集》卷2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4页。

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③ 同上书，第155页。

④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⑤ 李白：《行路难其二》，《李白集校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1页。

然而，就是在这种俗滥之中，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再顾及政教的要求，去为国为君为民而作，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写作。诗文写作不是公家的事，而是私人的事情，文人的文学兴趣从“经国之大业”转移到一己之情怀上。这看起来似乎是文人思想志趣的退化，然而这种退化恰恰预示着文学的进步。文学在真正地与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附着于外在的政治权威和抽象的道义观念上。长期被“风雅颂”的理论模式钳制的诗歌又开始回归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①的本职上。“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②，文学本来就是抒发个人情感的东西，《诗经·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如此。至于被编入《国风》，成为“风教”的工具，这是政治统治者强加于它的功能，文学本不该如此。文学回归自身是文学发展的大潮流。这股潮流从中唐开始涌动，至宋代逶迤而下，到了明代，已成长江大河。所有企图回到秦汉盛唐的复古运动，只能成为这股大潮中的逆流。明清两代，主流文人陷在宗唐宗宋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只能伴随着正统观念和专制体制走向衰微，而作为古代主流文学的标志的“诗”，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最终抛弃了诗教的禁锢，摆脱了主流文人宗唐宗宋的羁绊，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广大人群的日常生活，与古典主义对立的世俗主义（日常生活派）逐渐成为文学主流。

文学，尤其是代表着雅文学的诗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关注，意味着社会意识的重大转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人生态度的变化。在经历元代的磨砺和朱明政权的打压后，明代文人已少有前朝文人那种普遍的贵族感觉，尤其是吴地文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平民心态。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和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环境，使许多文人乐于平居乡间市井，尽管有许多人也参加科举考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汉书》卷30，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② 萧统：《文选》卷16，潘岳：《闲居赋序》，李善注曰：“《韩诗序》曰：劳者歌其事。”《太平御览》卷53，引《韩诗》曰：“饿者歌食，劳者歌事。”